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六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平原君与信陵君

段进利
／ 著

战国四公子
皆以养士闻名，
尤其是赵国的平
原君和魏国的信
陵君，以礼贤下
士，养士储才，
引领一代潮流，
在他们身上体现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粹。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6辑)

平原君与信陵君

段进莉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49-5

G·2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群雄争乱世 战国士风流

..... (2)

二、浊世佳公子 赵胜平原君

..... (11)

(一)为国举贤不计嫌 楚客原比红颜重

..... (12)

(二)毛遂脱颖现锋芒 平原捐家拒强秦

..... (17)

(三)纳谏公孙拒受封 弘扬学术播美名

..... (22)

三、济难真豪侠 信陵魏无忌

..... (26)

(一)礼侯嬴尚贤德播 交朱亥下士名扬
..... (27)

(二)倾身救赵义干云 解围邯鄲名天下
..... (30)

(三)谦和留赵十年日 博浆徒中识贤能
..... (34)

(四)英才总被君王妒 落寞晚岁堪叹惋
..... (36)

结 语 (41)

引 子

历代吟咏战国四公子的诗篇不绝如缕，如晋代诗人张华《游侠篇》曰：“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名。龙虎相交争，七国并抗衡。食客三千余，门下多豪英。游说朝夕至，辩士自纵横。孟尝东出关，济身由鸡鸣。信陵西友魏，秦人不窥兵。赵信南诅楚，乃与毛遂行。黄歇北适秦。太子还入荆。美哉游侠士，何以尚四卿”。

唐代大诗人李白《送薛九被讪去鲁》诗云：“蛾眉笑躑者，宾客去平原。却斩美人首，三千还骏奔。毛公一挺剑，楚赵两相存。孟尝习狡兔，三窟赖冯援。信陵夺兵符，为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刎首为李园。贤哉四公子，抚掌黄泉里。借问笑何人，笑人不好士”。

宋代刘攽《咏史》、邵雍《四公子吟》，元代王结《咏史》，明代张元凯《北游留别阳山顾愿》以及清代陈其年《平原县作》等诗作，在战国纷争的背景中，更吟咏出对于平原君和信陵君二英侠事迹的昂扬称颂。

文人墨客的翰藻辞章中充满了对“适彼乐土”的憧憬与“昔人不复”的叹惋，然而，这个令历代骚人所神往的时代却不是熙和丰饶的太平盛世，竟是被明末三子之一的王夫之论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所谓“宁为治世犬，不作乱世人”，人心思定，末世乱政历来是历代文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而以“礼崩乐坏”为特征的战国时代被公认为中

国历史上风云幻变、征战杀伐的一代乱世，虽批判声讨者代不乏人，但是颂美向往之音更是屡见于后人笔端。而如果将历史镜头聚焦于战国四公子的话，未遇其人的遗憾与想见其人的讴歌更是充斥文苑的主流声音，间或可觅的批评仅是隐现于史家笔记中的反思，总该一代的仍是那一派饱含憧憬的叹惋之音。

在战国时代的纵横捭阖中，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皆以养士闻名，并称为战国四公子。其时，“晋国天下莫强焉”的独特地位虽然随着“三家分晋”而瓦解，但战国七雄中的赵、魏、韩仍以三晋之名不绝于史册，更在广义的晋国文化联盟下共抗强秦，四公子中的平原君、信陵君都称得上是三晋英侠，而其联手拒秦的佳话更是战国时代不绝于史的壮举。

一、群雄争乱世 战国士风流

史家多以“春秋战国”并举，“春秋”得名于鲁国编年史书《春秋》，“战国”成为一代之专名则源自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战国策》。“战国”一词屡现于《战国策》一书，如《秦策四》载顿弱言：“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襄王称：“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言：“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言：“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需要指出的是，《战国

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书名或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诸名。西汉末年，刘向在校订群书时去重互补，始定名为《战国策》。其在序言中称：“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战国策》中策士屡称的“战国”所指的是具有相当作战实力的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大诸侯国，而“有力为战”的七国之“战”笼罩了这二百余年的全部历史，刘向以“战国”命名一代，虽非首创，却不失精当。而“战国”便和“春秋”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中唯一得名与帝王无涉的时代，而这历史的命名中实已暗含了这个时代的特质——礼崩乐坏、群雄对峙，争战纷起，这个时代更孕育了一个新兴的阶层——“士”。

刘向在《战国策·序》中以文化总结的俯视视角精辟概括了战国景象：自从孔子去世之后，齐国大臣田氏取代了姜氏齐国，智氏、韩氏、赵氏、魏氏等六家把晋国瓜分，由此引起了传统道德伦理全面崩溃，君臣上下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到了秦孝公时代，放弃礼让而以战争为贵，排斥仁义而使用诈谲。由此，那些篡位盗窃之徒，变成了诸侯王公；善于诈谲的国家，借机兴起，成为强国。各国间互相仿效，彼此吞并，大国兼并小国，军队连年作战，流血遍野，造就了“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的道德沦陷局面。在惨酷的兼并战争后，形成了拥有万辆兵车的七大诸侯国和拥有千辆兵车的五个小国，这些国家彼此敌视，勾心斗角，争夺利益，酿成了“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

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风气，而在这个时候，那些讲求道德的人士，几乎没有施展才智的机会，象孟子、荀子这样的儒学大师，并不被社会所重视，而那些游说四方，善于权谋之辩士，却被世俗所见重。刘向以正统儒家身份所作的道德批判自然犀利锋锐，而身为史家的他同样具有洞穿史实的穿透力。“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的时代风气凝聚了这一时期“争于气力”的时代特征。

在春秋末年晋国的政权中，最有势力的卿大夫为智氏、范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家，即所谓“六卿”，六卿间相互兼并。公元前493年，赵氏驱逐范氏和中行氏出境，国政落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韩康子虎为首的韩氏、赵襄子无恤为首的赵氏和魏桓子驹为首的魏氏四家之中，公元前455年，智伯瑶与韩、魏合兵攻赵，决汾水以灌晋阳城。而在城即将攻破时，由于智伯瑶不慎流露了吞并韩、魏的野心，原本为其所逼迫的韩、魏于是和赵氏联合，临阵反戈，捉住了智伯瑶，智氏被灭族，土地也被瓜分。三家的实力大增，而晋国的国君虽然存在，但已无力统治晋国了。随后，三家又将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外，也全部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是晋幽公，迫于三家的势力，这位国君反而要去拜见三家大夫，晋国已经名存实亡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加封韩虔为韩侯（即韩景侯）、赵籍为赵侯（即赵列侯）、魏斯为魏侯（即魏文侯）。韩、赵、魏三国原来是晋的三家大夫，所以又称作三晋。而在三晋封侯后十七年即公元前386年，齐国的蜕变也

已完成。田氏独揽齐国大权数世，传至田太公（即田和）时，正值齐康公沉湎酒色，田和借机废掉这位姜齐的末代国君。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在浊泽相会，把自己正式列位诸侯。公元前386年，田和即被周天子封为齐侯。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就表面而言，是各统治者内部的争权斗争，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春秋战国间新、旧势力相争的一个缩影。以传统道德眼光看，大多为以臣弑君的无义行为；以其时的尚利取向看，则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演进。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的约有十几个国家。其中大国有秦、齐、楚、燕、韩、赵、魏，这就是所说的战国“七雄”。七国称雄的局面是在残酷的兼并中形成的，在“敌侔争权”的生存压力下，“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争与权谋取代春秋时的诗礼和道德，成为战国时代的主宰声音。

各诸侯国为了拓展疆土，增加收入财源、实现称霸而频频发动战争，战争一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以军事竞争为集中体现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刺激下，各诸侯国的经济、技术、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铁器的广泛使用。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孟子》中已经有了“铁耕”说法，而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铁制手工业工具、铁制兵器等，种类繁多，可见当世铁器的普及。铁器的普遍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耕作技术的

进步,在战国时代,牛耕已开始推广,并出现了“深耕易耨”的先进耕作技术。另外,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战国时期的各国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齐、赵、魏国修筑堤防以御黄河之害;为了灌溉而开凿的运河也增添了许多,如魏国西门豹曾“引漳水溉邺”,秦国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水工郑国在秦国修建的郑国渠等。《庄子·天运》中记载的“桔槔”则是当时一种先进的灌溉方法。与之相伴的还有施肥、播种、除草、除虫等农业技术的巨大发展。技术进步带来了农业生产量的提高,更有专事农学研究的农家出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制工具用于手工业,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的主要手工业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煮盐和纺织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又促进了战国的商业交换关系的发达。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互通有无,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战国城市的经济功能也逐渐在原本政治、军事的功能上发展起来,许多城市还变成了交换的中心,如燕之涿(今河北涿县)、蓟(今北京市),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南),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同时,作为联系各个城市的交通网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交通网,商人们在这些交通要道上往来不绝。这样也就打破了战国以前那种各地区间闭塞不通的局面,各地区的物资得到交流,于各地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大为有利。

第三,战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原本的井田制度落伍于时代,逐渐走向了解体。秦

国经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在法律上承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由于租税徭役负担沉重，有的农民在失掉耕地之后，便为人雇用；有的则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农民则依附于豪强地主，甘愿作佃农。随土地买卖而来的土地兼并，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出现了许多贵族及其以外的土地占有者。战国时代的贵族，包括各国国君的亲属和贵戚，占有大量的土地。其中有些人除享有征收封邑赋税的特权外，还占有大量土地，例如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就是这样。他们都以封邑的租税为自己的收入，但须纳税给国家。他们还利用权势包庇所属农民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许多不堪赋税、徭役负担的农民，也就被迫归依他们。战国时代，还出现了许多大手工业者和大商人，但他们“以末（工商）致财，用本（农）守之”，商业的收入又被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了。

由竞争求存带来了技术的进步，随之引起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之出现了土地私有制，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自然要求上层建筑方面也随之调整，于是，各诸侯国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变法图强的活动：魏国有李悝变法，赵国有公仲连改革，楚国有吴起变法，齐国有邹忌改革，韩国有申不害改革，秦国有商鞅变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的因果反应并非如同多米诺骨牌般的单线连锁反应，而是一个交织互动的影响网络，各种因素彼此交错作用，构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而这脉历史主潮中，我们很难依照逻辑式的条分缕析来为各个因素在因果关系链上定位，但是我们可以唯一确定的是，在这段历史浪潮中

卓立潮头、独领风骚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士”。各诸侯国间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激烈竞争最终聚焦于人才的争夺，诸侯贵族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各类人才才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力量，一时间，尊贤养士，蔚然成风，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文化景观。

“古者学在官府”，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立。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而且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学校，平民百姓是没有学习权力的。自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来在王朝或诸侯之国做史官的人，因王朝之衰微、诸侯之覆灭，遂散之四方，以其所学的知识传世。同时，时代的风云际变使官禄的世代相袭也不复存在，周初以来世代相传的王官，逐渐失去世禄之业，无法子弟承袭，其所掌守的学术也随之流散于民间。私人办学由之兴起，如孔子办私学时倡导“有教无类”，极大地拓展教育范围，促成了知识的下移和传播，而这些流落民间的知识传播者和平民阶层中的知识获得者便成为“士”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一批在竞争和兼并中被淘汰的旧贵族们失去了原有的贵族身份，变成了平民。“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原先的王室贵胄成为今日的庶民，一般贵族们“降在皂隶”更是为数不少。而这部分人都是知识的拥有者，知识并不因地位身份的变化而消失，他们同样为当时的文化下移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士”的又一个来源。此外，在世卿大夫家中的“家宰”，“家臣”中，有不少都是博学多能的人才，大都能文能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技能拥有者，他们也是“士”的一个来源。

“士”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政治上，他们没有“一朝委质，终身为臣”的效忠义务；经济上，也不必依靠贵族的恩典和施舍来生活；思想上，先前的礼义道德再不是可以禁锢思维的牢笼。而正是这种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凝结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泽被百代，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段蔚然成观的文化盛景——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各派思想，交汇融合，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也多在这一时期出现，传统文明的精华即奠基于此。骤然遽变的社会结构，尖锐对立的重重矛盾，烽火相连的兼并战争，空前活跃的文化思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最为璀璨的时代。

诸侯大夫为增强实力，保全自己，以图逐鹿中原，身怀一技的“士”无疑是倍受青睐的。早在春秋即已开始的“养士”，于此大为盛行，世卿大夫争相“养士”，蔚然成风。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即捐牛赠布，屈己养士。而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开设“西河之学”；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办稷下学宫，广揽天下学者，讲学立说，议论朝政。其后则是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养士”多过数千。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养士规模实非春秋时可相比拟，而战国的养士之风亦与春秋时期迥异。《孔丛子·居卫》称：春秋时，“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

也”。此言不谬，春秋时期，虽然王室衰微，但却保持着形式上的威严与表面上的等级森严，“公”“私”观念分明。收养私属、私卒、私士，为社会舆论所不许，养士者常被视作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其风不盛自在情理之中。战国时，养士则已变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尚风气，上至国君，下到大夫，无不以收养门客为荣。“养士”在集中大量人才的同时，还能迅速为自己博得好贤声誉，以号召天下，更能扩充自己的实际力量，以称霸诸侯。“养士”成为上层权贵积累政治资本的最佳方式，故而他们争相礼贤士人，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不问出身，不问国别，不问德行，唯才是用，而这种人才价值观的极端膨胀，使得“士”成为战国人才市场的绝对主导，“士”之才能成为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尺，从而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自由竞争的繁荣“市场”。

在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崇能惜才的时代背景下，空前广阔的历史舞台和灵活有效的社会机制，使得“士”阶层迅速地发育和成熟，成为独领一代风骚的浪尖人物。在公平而自由的人才机制下，“士”中许多优秀人物有机会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布衣卿相”成为后世最为津津乐道的战国盛事之一。而这些优秀的“士”活跃于战国时代波谲云诡的内政外交中，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连横合纵，更有“士一怒而天下诸侯惊”的威慑力。战国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感得以满足的最佳时代，也正因此，历代士子文人才对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充满了向往之情。

在群雄纷争的乱世时代，“士”的高昂造就了一代士人

风范，成为时代的主角。然而，那些养士的权臣贵族，尽管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储存人力资源，积累政治资本，但是，世风濡染下的他们在与“士”的交往中，蜕去了贵族习气，知人善用，礼贤下士，不以富贵骄士，不因贫贱轻士，而正是这种“礼士”之风为“养士”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基础，并深刻的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尚贤传统之中。在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下，这些贵族们难能可贵的恭和下士无疑成为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的传统士子们的最大渴望，“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普遍的共通心态，尊贤重士的战国时代自然成为他们的理想时代，而那些尊礼才士的贵族们当然成为他们渴求的人主形象。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无疑是他们当中最为突出、最为杰出的代表。而三晋公子平原君、信陵君更是其中翘楚。

二、浊世佳公子 赵胜平原君

在赵国历史上，赵武灵王是一位能干的国君，胡服骑射，励精图治，赵国国力在其执政期间也有相当的发展，然人无完人，赵武灵王由于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狐疑不决，竟然引起兵变，最终落得个饿死沙丘宫的凄惨下场。随后即位的是他的儿子赵惠文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称平原君赵胜为“赵之诸公子”，可知其为赵武灵王之子，而《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可知，平原君为赵惠文王的弟弟，《史记·六国年表》载：“赵惠文王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从赵惠文王刚刚即位就对平原君的封赏重用即可看出二人关系的亲密，而《战国策·赵四》载：“谅毅曰：赵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则进一步推定，平原君为赵惠文王的同母兄弟。除了血缘关系外，赵惠文王器重平原君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赵胜是赵国诸公子中最为贤明的一个，喜欢求贤纳士，聚于门下的宾客大约有数千人，而其中不乏才能之士。正由于这样特殊的关系背景，平原君才能够先后辅佐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两代君主，虽然三度罢相却又得以三次复位，（据史载，其余两次为相的时间分别是周赧王四十九年，赵惠文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66年）和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但这两个时间相去不过一年，疑指同次拜相，然而，史料漫失，亦不可定）得以善终。

（一）为国举贤不计嫌 黷客原比红颜重

平原君的封邑在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北），在当时，各贵族也和平民一样担负着向国家交纳租税的义务。而平原君既已拜相，又是赵惠文王的亲弟弟，权倾朝野，一般人是不敢向他收税的。奴随主贵，平原君的家臣和家奴自然也倚仗平原君的势力飞扬跋扈，不把收税者放在眼里，抗税不交。周赧王四十四年，即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时任田部吏的赵奢，田部是赵国负责收田地之租税的部门，作为该部门的长官，赵奢对平原君家拒不交纳租税甚感头疼，屡屡督促，而平原君家却不予理睬。为了保证纳税制度的顺利执行，赵奢将平原君家中九个负责租税事宜的